



2009年9月9日,于幼军在中国国家图书馆。李昭淳 摄



于幼军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文德分馆的留影 李昭淳 摄



于幼军撰文谈当年被撤职后生活

称:身陷逆境是人生大学校、大熔炉

四年多前,我经历了一场人生沉浮起落,从中深切感悟读书和图书馆还有一大功用——疗伤治病。图书馆能够帮助人们抚平心灵创伤,摆脱精神困境。
据《羊城晚报》报道

受到撤职处分后,我过上了“文学与出汗”加清茶淡饭的生活

2007年9月,我从山西省调到文化部工作。次月,参加中共十七大后,连续3个多月率队到文化部下属10多个单位和11个省、市、自治区调研,形成了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,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,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工作思路和对策措施。

我执笔整理调研成果拟出调研报告,经文化部党组、部长办公会议多次讨论达成共识,报党中央分管领导和中宣部同意后,主持召开了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,做动员部署。

正当我全身心投入新的工作,准备大干一场之际,突然晴天霹雳,先是被接受调查,半年后受撤职处分。

受处分后,我面对现实,在反求诸己、痛定思痛之际,反复告诫自己:“败走麦城”,身陷逆境也是人生大学校、大熔炉。运交华盖、遭受挫折,理想信念不能变,精神身体不能垮,不虚度宝贵光阴,不白领人民俸禄,利用赋闲待业之机,读书写作去也。

2008年10月,受处分后十来天,我安慰、安顿好80岁高龄的老母亲,来到位于北京紫竹园畔的中国国家图书馆。

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与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负责同志商量,在行政办公楼二楼安排了一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房间,配上了书桌、书柜和一张床,供我读书写作。几个月后,又搬到五楼一间十来平方米的房间,在此开始了赋闲待业的读书生活。

我每天上午八点多抵达这间“紫竹书房”,读书、作笔记摘录至中午十二点多,在图书馆里的员工食堂打点饭菜,吃完休息个把小时,下午继续阅读至六点多离馆。

回家后自己动手煮碗荞麦面、豆面之类,打上两个鸡蛋或丢进一根广东腊肠,前后十来分钟连煮带吃就对付过去了。

周末、节假日图书馆的员工食堂不开伙,我就到附近的“庆丰包子铺”,买上二两肉包子或饺子,就着茶水吃下去。

后来,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开了一间为读者服务的“品诺咖啡店”,每逢周末、节假日读书饿了,就到那里花18元叫上一份“碟头饭”,外加10元的素菜汤,倒也津津有味,比吃包子改善多了。

晚上我则去散步、游泳或打球,过上了“文学与出汗”(借用鲁迅一篇杂文的题目)加清茶淡饭的生活。虽孤寂清苦,却也乐在其中。

每天读书不辍,渐渐,书读进去,人走出来了。

与好友曹淳亮见最后一面,在广州陪伴年迈的母亲并潜心读书

过了两个多月读书郎的生活,一天忽闻挚友——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曹淳亮病危的消息,次日即乘飞机回广州。下了飞机直接赶去医院,总算与相识30多年的好友见上最后一面。

那天淳亮可能是回光返照,神志尚清醒,可以轻声说话,我们聊了近1个小时,没想到第二天他即驾鹤西去了。

在亡友的告别仪式上,我见到了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长李昭淳,对他说:“我母亲最近的心情和身体不好,

我想在广州住一段时间陪陪她老人家。家里来访的朋友客人络绎不绝,你可否在中山图书馆给我找一处安静的地方,放得下一张书桌即可,供我白天躲在那里读书?”

李昭淳二话不说,当即爽快应诺。

第二天(12月30日)上午,我到了位于文德路的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分馆。步入馆内,但见古树参天,林木荫蔽,全无大都市的喧闹尘嚣。楼、院面积均不大,却历史悠久,可谓广州的文脉之地。

李昭淳把我带到善本书库,让我看一册新近入藏、已有800年历史的镇馆之宝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。该善本刻本与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、金代山西民间集贤刻印、曾长期收藏在山西赵城广胜寺的《赵城金藏》年代相近,堪称国宝。

接着,李昭淳又把我引至二楼东南角一约10平方米的房间,已摆放好了书桌、书柜、沙发等,窗明几净,阳光明媚。我谢过了李昭淳等人,当天就在那里开始了读书生活。

每天到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读书写作,元旦春节也不曾例外

过了多日,我才了解到,旁边几位馆长的办公室均只有10平方米左右,给我使用的这一间光线最好。这原是一位副馆长的办公室,他临时腾出来让我用。

细心的李昭淳担心我整天埋头读书太累、太闷,隔三差五的来与我聊会历史、宗教,送上帮我查找的图书资料,还嘱咐在我“书房”旁边的毛凌文副馆长和张喜年博士等人,协助我及时查找和复印资料,使我得以专心、顺利地读书和写作。

我像往常上下班那样,每天上下午都准时来到这间“文德书房”读书、写作,元旦、春节、节假日也不例外。以至于李昭淳和我开玩笑:“你元旦、春节每天都来馆里‘值班’,我们应该给你发‘加班费’。”我笑答:“我也没有给你们交房租,扯平了。”

这里十分安静,且没有人知道我在此读书。除黄崧华、刘斯奋、赵军、张文可数几位老领导、老朋友恰巧碰上了,与我促膝交谈一番,基本无人打扰。

这段时间我的读书效率较高,两个多

月时间,除读完十多本书,阅读、复印了一百多万字的资料,还拟出了五六万字的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一书的写作提纲。该书是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的第三卷。

我至今还记得,在写作第二卷时,我曾委托李昭淳帮助查找苏联“肃反”、“大清洗”时基洛夫被刺这一关键事件的有关史料。

可以说,前后相隔二十多年写作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一、二、三卷,让我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结了缘。

完成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等书稿后,接通知到新工作单位报到

2009年3月10日,我离开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回到北京,又一头扎进中国国家图书馆的“紫竹书房”,并开始了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一书的写作。

这时已从文化部调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的周和平和其他馆领导,热情地为我的写作和生活提供细致周到的服务,安排馆内决策咨询部的王海燕主任和咨询员张曙光博士,协助我查找、复印图书资料。

每隔一两个月读书写作累了,我便拿出十天左右的时间,到中国近、现代史重大事件发生地、重要人物活动的地方和革

命老区去实地察看、收集资料,请教当地革命老前辈和专家学者。

我先后跑了江西、福建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上海等10来个省区市,收获甚丰,为构思写作奠定了基础。

如此春去秋来,我阅读了三四千万字的图书资料,复印了几百万字的资料,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,书桌上的书稿也越攒越厚。

经一年半努力,我完成了《社会主义五百年》第三卷《社会主义在中国》的初稿,又着手把一二十年前与友人合著的第一、二卷中由我负责“切块包干”写作的

部分进行修订。

终于,在2010年12月25日,我校对完毕并签发了送往出版社的一、二、三卷全部书稿清样,总算做完了一件事情,顿觉如释重负。

非常凑巧的是,那天上午,我刚托人把书稿送出,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的电话,通知我下周到新工作单位报到。

——本文应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建馆100周年征文活动约稿而写。(有部分删节)(作者为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)